

换个角度看文化:中国西南少数民族 防灾减灾文化刍论

周琼¹

【摘要】: 民族灾害文化是少数民族与自然灾害相伴求生过程中积累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发挥了防灾减灾避灾的作用。西南少数民族的灾害文化有宗教信仰、禁忌习俗、敬畏自然的思想及驱逐疫人等精神层面及建筑、饮食、医药、乡规民约及村寨防护等物质生活行动层面两类内容。它具有文化的历时性、包容性、调适性特点,也具有民族文化的传承性、累积性、固守性及地域性、多样性、共享性特点。按亲缘、地缘、族际、国际等口耳相传或文字记载的方式传承,分讯息预警传递、物资互享、自我救助、逃生避灾技能、灾后联合共建及备灾仓储建设六个类型。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它还存在个体与群体层面的弊端,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提升优化转型的任务。

【关键词】: 灾害文化 少数民族 防灾减灾 避灾

【中图分类号】: C95、X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691 (2021) 01-0118-12

灾害文化作为文化的特殊组成部分,成为近年灾害史研究的新路径、新方向,是人类社会在与灾害共生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类型,包含灾害认知、记忆、记录、传承,与灾害有关的思想、心理、伦理、祭祀、信仰、禁忌、习俗、文学、艺术,以及应对灾害的系列措施、制度及社会影响等内容,具有“文化”的区域性、民族性、社会性、历时性、系统性、兼容性、传承性等属性,也具有“灾害”的复杂性、多样性、变迁性等特点,在历代防灾减灾抗灾实践中不断积淀,遵循经验积累—传承—实践中丰富完善—技艺方法再优化等发展路径绵延延续。灾害的广泛性、常发性及后果的滞后与累积性特点,使灾害文化不断推陈出新,内涵不断丰富。少数民族灾害文化因其经济、文化、历史进程的特殊性,而最富时代及区域特色。在全球化背景下,运用多学科方法,抢救性搜集、整理、研究那些未能进入传统史料、具有浓郁民族特色、趋于亡佚的少数民族防灾减灾避灾文化的史料,能够补充、丰富传统灾害文化的内涵,促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

学界对单个民族,如彝、蒙古、苗、瑶、壮、藏、独龙、傣等民族的灾害文化进行过个案研究,1 个别研究结合扶贫工作探讨,但尚无从中层面对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的内容、类型等进行研究的成果。打破学术研究的“路径依赖”惯性,以全新视角理解、诠释并拓展民族文化起源传承动因的既有思考,以新路径发掘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灾害内涵,探索人们耳熟能详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起源与防灾减灾避灾的密切联系,既是灾害史研究转向及拓展的新需要,也是新时代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的新要求。本文首次对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的类型及特点进行探讨,以资鉴于中国与南亚东南亚防灾减灾体系构建的现实需求。

一、中国西南少数民族防灾减灾文化的内容

中国西南是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滇川黔桂分别有 52 个、56 个、50 个、56 个民族繁衍生存,四省区世居少数民族分别有 25 个、14 个、18 个、11 个,是中国最典型的多民族融居地。各民族聚居区的地理位置、地质结构、地貌类型及气候类型、生态环境千差万别,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绚丽多彩,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传统及利用自然资源的方式多种多样,孕灾因子也因此复杂多样。明清以降,随着西南各民族聚居区的农业垦殖及工矿业开发,^①生态环境受到极大冲击及破坏,自然环境的承灾力及灾

¹作者简介:周琼,女,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环境史、灾害史、生态文明等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项目号:17ZDA158)的阶段性成果

害区的自然修复能力发生了变异，区域性自然灾害呈现日渐频繁的态势，以地震、泥石流、滑坡、水旱、霜雪、疾疫、风雹、山火等灾害为多见。各民族在防御、对抗各种自然灾害的过程中，逐渐累积了与此相关的文化。

不同区域、民族的灾害文化，既有不同的内容及表现形式，也有因面对相同灾害而产生的类似的习俗、思想及防灾避灾的方法及传统，故西南少数民族防灾减灾文化的内容可分为两大类型：

（一）精神层面的祛灾、防灾、减灾文化及措施

西南少数民族精神层面的祛灾、防灾、减灾文化及措施，与各民族对自然环境的认知及原始宗教信仰相伴随。很多源自于防灾减灾避灾的观念、意识及行为等，虽然是消极性的措施，但却嵌入到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并对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某些防灾减灾避灾的理念、思想及措施甚至成为民族文化的标识。这一层面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

一是以原始宗教信仰、禁忌习俗为核心的思想文化措施及传统，如不同民族常用的驱鬼、祛病、祭神、隔绝染疫病人等习俗，以及为了避免灾害而禁食某类动植物、禁入神山神林神泉区、禁止某类行为习惯等禁忌，不仅在滇川黔桂渝藏等地的少数民族中广泛存在，在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普遍存在。

不同民族都有这些习俗及禁忌的原因，与其导致或防范某类灾害或疾病的意识有密切关系，即区域性、群体性的某类行为因偶然或巧合会经常性地导致某类灾害，就成为族群的禁忌，或某类行为措施能有效防范某类灾害、疾病，也就成为不约而同共同遵守的习俗。如2019年笔者的调研组在沧源佤族地区调研时，有个佤族村民住房的电线被雷击，他因此受伤住院，出院后害怕“雷鬼”继续害他，赶紧祭祀了雷神雷鬼，并跟村民说要给村寨里的雷神留出空位，不能把电线随意架在住房树木上干扰雷鬼。这些观念虽然迂腐但却更能被村寨居民所接受，在客观上对避免新的雷电灾害隐患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一些少数民族由于观念限制，生病后大多不去医治，而是采取祭祀鬼神、占卜等消极的措施，虽然可以用现代医学让疾病机体自然痊愈及心理或精神疗法的理念看待其文化内涵，但很多时候会延误治疗时机。

西南少数民族大多具有的敬畏自然、神灵的传统思想，也是源于灾害防范的结果。各民族受制于不同自然地理环境，并在与不同类型的自然环境的调试和博弈中，为求生存、稳定、安康和发展，逐渐形成了敬畏、尊重自然规律，不妄自干扰自然生物生存发展、破坏其生存空间的思想及意识，以及不擅入灾害易发地、不干扰这些地区的神灵，以免神灵降下新灾祸等传统习俗。

二是各民族防灾减灾避灾的社会生活习俗及行为习惯，是灾害文化中最具区域特色的文化内涵。近现代少数民族村寨防护习俗中具有积极主动的防灾减灾内涵，如彝、白、纳西、佤等民族会通过占卜、祭祀、祈祷等活动，让族人在村寨及住房附近清除杂草、疏通沟渠、修理树木枝杈、修补平整道路桥梁等，以清洁、干净、整齐的形象祈求神灵护佑村寨。这在客观上对少数民族躲避预防灾害及疾病有积极作用，是一种积极的防避灾害的文化行为。如云南临沧的佤族会通过对村寨附近的山沟、道路进行清淤疏浚，减少山坡的水土流失及滑坡灾害，防护村寨及族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些行为成为一种良好的村寨传统习惯传承至今。

三是有效防范传染病的习俗及传统，尤其是将特殊传染病瘟疫病人进行隔离、驱逐，以减少村寨族人感染疾病的既消极又积极的避灾减灾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挥有效的防护作用。这是西南很多少数民族面对热带亚热带地区常见的麻风病、血吸虫病、伤寒、疟疾、鼠疫等瘟疫时，经常采取的防范习俗。通常是到远离村寨的山上重新建寨，把传染病人转移过去单独居住，如怒江州丙中洛第一湾的麻风病村，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云南昭通、楚雄、大理、西双版纳、思茅、德宏等地普遍存在的麻风村就是这种措施及文化传统的体现；或是将病人驱逐出村寨任其自生自灭等空间隔绝的方式。这些防范传染病的习俗及传统具有尊重病人、给病人保留生存空间，同时也保护族人免受疾病侵害的风险躲避的文化内涵。

此类消极措施是各民族在面对灾害又无力抗拒时，下意识采取的初级层面上的文化，是少数民族灾害文化产生初期的主要行为模式，是各民族防灾减灾中较常见的文化传统，在客观上具有各类生灵各安其域、不越界惹祸造灾等人与自然（生物）、人与人和谐共生的防灾避灾认知内涵。

（二）积极的祛灾、防灾、减灾文化及措施

西南少数民族积极型的防灾减灾文化传统及措施，是各民族灾害文化发展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第二个层面的文化内容，涵盖了各民族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一是村寨选址、建筑材质的选择上，具有有意识的、积极的避灾防灾的传统文化内涵。这类积极主动的防灾减灾避灾文化功能，以百濮族系和百越族系最为典型。

西南百濮族系的绝大部分少数民族都有洪水神话的传说，各民族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深受其影响。这与西南、南方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一般都位于季风区，受东南季风及西南季风的影响明显，单点式大暴雨比较集中，极易形成洪灾有密切关系。聚居于这些地区的彝、景颇、苗、瑶、壮、白、纳西、傈僳、普米、哈尼、怒、独龙、佤等民族在选择村寨及聚居地时，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那些不容易受到洪水袭击的略平整的山顶或半山地区。这些地区虽然交通出行不易，但确实避免了洪水灾害的侵扰，成为西南很多民族聚居区特有的村寨景观文化。

在房屋的建筑结构上采用将粮仓和房屋分离的方法来保存粮食，以及为了防止火塘火苗上蹿燃烧屋顶而修建“汉木齐”，即独龙族、佤族、彝族一般会在火塘正上方搭建一层架子，将需要晾晒烤干的食物及其他潮湿物铺在上面，既可晾晒食物又可以防止火星上窜引发火灾。目前，很多民族文化学家往往忽视了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的避灾文化功能，往往只注重到其作为民族村寨文化的表象性功能及内涵，而逐渐忽略并淡忘了其灾害文化的特性及功能。

泰傣等百越族系聚居村寨地址的选择、房屋建址及朝向、坡度的选择等，也具有防灾减灾避灾的文化内涵。一般而言，百越民族的村寨近水而居但远离水深流急、坡度大的主河道以避免水患；村寨附近均有明显的竹子和榕树两大绿色标识。竹子一般在村寨周边、河水溪边、房前屋后及田间地头，既可作为方便砍伐的日常生活所需的食物、建筑材料及家居用材的来源，也可阻挡大型兽类攻击村寨，在河边的竹林还是人与水域的分界线及标识物，使人避免受到河水及其有害生物的伤害。榕树在村寨内部或村寨边缘地带，很多大榕树作为村寨的神树，在村寨人群心里有消灾避难护佑平安的作用。节日期间或遇到大型灾难的时候，大榕树会受到族人的祭祀及供奉。

其建筑式样、取材用材等的选择，也有避灾防灾的目的。干栏式房屋建筑的避灾功效极为显著。下层住家畜（牛羊马猪鸡等）的目的之一，是让自家饲养的家畜（财物）近身居住，以保护其不被野兽随意侵犯抓捕。人住在二楼，也能够避免虫、蛇和野兽的直接侵害。若有极为凶猛的野兽来临，抓捕一楼的家畜充饥后就不会侵害二楼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有以畜护（换）人的避灾防灾作用。干栏建筑在材质的选择上也有防灾减灾的目的，如为了防范毒蛇从楼下水边入侵居室，一般会使用方形柱子（也有美观的功用）。选择竹楼不仅由于其易于取材、通风凉快，物美价廉，还因为竹子在热带亚热带气候多雨多虫多微生物的条件下，不太容易腐朽，防水防蛀效果较好，有易于清洁、迅速干燥、减少病菌等功能。此外，竹楼还可减轻地震、滑坡对人畜造成的毁灭性影响。在竹楼的中部，一般都有一根顶梁大柱，即通称的“坠落之柱”。这是竹楼里最神圣的柱子，不能随意倚靠和堆放东西，有避免竹楼因为大柱倾斜而倒塌，保护竹楼里的人畜禽等免于灾祸的内涵。

同理，佤族的干栏式民居建筑中，晒台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其构造简单，竹木等材质轻便，故而地面承重较轻，适合复杂、陡峭凸凹的山地地形，且在雨季不易腐烂，干燥凉爽，在滑坡地震灾害中也能减轻其影响，就算倒塌也不会对人畜造成致命性伤害。这类防灾避灾的传统文化，在少数民族中代代相传，逐渐成为既有民族特色的建筑文化内涵，也有灾害文化内涵的传统文化必不可少的内容。

二是饮食中的防灾减灾避灾文化及其传统，是少数民族积极主动应对灾害的极为普遍的文化形式，主要表现在食材选择及饮食习惯、习俗等方面。百越族系的少数民族在饮食食材的选择中，大多以自然生长的草本木本植物为食物原材料，比如水边山脚的各类野花野菜及林木，很多在河湖溪潭附近、在山坡地上生长的植物的花、根、茎、叶、果等都是入菜的好原料。各民族野菜谱系中，只要没有毒素，花花草草、根根蔓蔓乃至苔藓地衣，都是自然生态的美味食材，且就地取材、根据本地生态及生物类型取材入食，物美价廉，是百越民族的饮食习惯及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除本地食用植物外，当地的虫卵蛇蚁等也是食材的来源，如菜花虫、竹虫、马蜂蛹、野蚕蛹、蛇、蚂蚁卵等，都是美味的高蛋白食材。这些食材在民族医药里，有不同的药用及保健功效，是防病治病的常用饮食食材。因此，来源于自然的酸甜苦辣涩的各种动植物，都是原生原味的具有防灾减灾功效的饮食百味，并有着其特殊、不可替代的文化内涵。

这些食材用现当代的话语体系来理解，具有天然野生、自然生态的特点，但从少数民族灾害文化的视角来看，则具有防灾减灾避灾的文化内涵。如苦、涩、酸、辣、辛、腥的野生动植物食材，大多具有清热解毒的药疗功效，这既是近年来南方及西南少数民族的菜系大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也是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灾荒时，能依靠野生的菜蔬瓜果躲过饥饿，而很少发生饥荒的原因之一。优良的自然条件及多样、丰富的自然食用资源，孕育了少数民族饮食中防病治病的习俗。不同民族的饮食文化习惯相互融合，最终形成各民族防灾减灾的饮食文化内涵。这也是千百年来，生存在河谷山箐里的傣族民族在遭遇瘴气、疟疾、鼠疫、麻风病等疾病的不断危害，但依然能够生生不息、繁衍发展的原因之一。

一些草本、木本植物，也具有驱除蚊虫毒蛇的作用，将其种植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在一定程度上可有效避免、预防畏惧这些植物的有害动物及昆虫入侵，客观上避免了不同的疾病危害源。这种文化习俗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已深深融入到了各民族的生产生活中，从而成为了公众普遍认同、具有标识作用的防灾减灾避灾文化内涵。

虽然西南一些少数民族也猎杀野生动物，但其对很多野生动物的崇拜，或是将很多动物赋予了神性并用不同的传说强化这种神性后，就产生了特殊意义上的灾害文化内涵。如德宏陇川的景颇、傣、阿昌、傈僳、德昂等民族中流传着猎杀食用野生动物后，会生大病或遭遇有灵性的野生动物报复的传说；独龙族认为人的一生打猎的数量不能太多，不然山神就会惩罚并降罪于他们，并有很多演绎而来的文化内容，让人不敢过多猎杀野生动物。这不仅在客观上避免人与动物的冲突及因动物引发的灾害，也保护了生物种群基数的多样性。

三是民族疾病灾害预防、治疗体系方面的积累及医药文化传统，以及在此基础上逐渐建立起来的不同民族如傣、彝、藏、苗、瑶等少数民族的医药体系，在本民族灾疫防范救治方面，发挥了极大的、得到普遍认同及赞誉的积极作用。这是少数民族在疾病（疫灾）预防治疗中的巨大成就，也是少数民族在防病减病文化层面较集中的体现。从很多案例及医疗实践中可见，很多少数民族已经建立起了防病治病的独立的医药体系，其医药治病理念及其文化内涵，已经成为了各少数民族防灾减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检索历朝史料，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尽管史料记载有限，但鲜有少数民族因大型瘟疫或饥荒而灭寨灭族的记载，其中虽然有交通及信息不通畅、本地人没有记录历史的习惯及汉文史料记录者不了解情况等原因。但也不排除大型疫灾少的可能性，按照常理，若发生严重瘟疫，对当地民族是极为重要的大事，当地的传说、故事里及村寨记忆里也不会完全没有反映。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少数民族医疗体系在防病治病方面的有效性及积极作用。

四是乡规民约中对破坏森林、引发火灾及随意砍伐森林导致水旱滑坡灾害的人员、家族、村寨等的制裁措施及法规，是防灾减灾文化的重要内涵。这些被称为乡规民约及习惯法的内容，成为各民族积极、主动防灾减灾中最有效率的措施及传统，也是少数民族以文字方式记录传承下来的防灾减灾文化内容之一。

如嘉庆四年（1799）云南通海秀山护林碑记：“将宝秀坝前面周围山势禁止放火烧林仰附近居民汉彝人等知悉示后，毋得再赴山场放火烧林倘敢故违，许尔乡保投入扭禀赴州以凭，从重究治，决不姑贷。”^①道光八年（1828）镇沅州“为给示严禁盗

伐树木烧山场事”立碑，要求村民李澍等在树木种植之地划立地界，规定若有混行砍伐、纵火盗伐不遵禁令者，罚银十两充公。

(2)

又如，清末云南大理弥渡县弥祉山的护林法规写道：“弥祉太极山老树参天，泉水四出千家万户性命，千万亩良田，其利溥矣”，由于当地森林被村民破坏，“近者无知顽民砍大树付之一炬深林化为荒山，龙潭变为焦土。水汽因此渐少，栽插倍觉艰难，所以数年来雨泽愆期，泉水枯竭，庄稼歉收。”光绪二十二年（1896）牛街瓦腊底村规禁止伐树，违者罚银十两；光绪二十九年（1903）大三村的《封山育林告示碑》规定，盗伐松树者“准乡约、火头、管事、居民将送官究治”，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民国年间。民国二年（1913）八士村民稟县知事陈祯，有“顽民”乱伐致龙潭干涸，陈祯出示通告，规定不准滥砍乱挖森林，“永远勒石”，村民也制定了惩罚规制，“藉资灌溉而重森林乱砍滥挖者，即由该村董、百长五十长等集众罚议，以示惩戒”。⁽³⁾这些内容从环境保护、生态修复、民族法律诸多层面来看，都有着巨大的价值及历史意义，从防灾减灾的民族文化内涵来看，也有其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二、中国西南少数民族防灾减灾文化的类型及传承路径

西南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山高谷深，地形破碎，自成相对独立、封闭的小地理单元，稍微平整的地区则被称为坝子。这既是西南少数民族众多的原因之一，也是民族文化丰富多彩的基础。如云南省土地面积 39.4 万 KM^2 ，其中山地面积占 84%，高原和丘陵面积约占 10%，坝子（盆地、河谷）面积仅占了约 6%。按行政区划看，全省 128 个县（市、区），除昆明市五华、盘龙两城区外，山区面积比重都在 70% 以上，18 个县 99% 以上的国土面积全是山地，几乎没有一个纯坝区的县。很多民族都聚居在相对独立封闭的地域空间中，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创建出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其中包括了丰富的灾害文化。不同区域民族的灾害文化，都有各自的类型及传承路径。西南少数民族的防灾减灾文化，也有自己独特的类型及传承路径。

（一）西南少数民族防灾减灾文化的类型

西南少数民族防灾减灾文化的类型，按灾害发生及救灾的先后顺序，可粗略地分为六种：

一是灾害讯息的预警、传递。少数民族民间也通常流传着大型灾害前，当地动植物出现奇异征兆的传说，因此有着相应的灾前、灾后信息的传递互通手段，主要以民族声乐器、狼烟、彩色旗帜等特殊方式通知、传递危险逃生的讯号。如云南文山州广南县贵马、里玉等壮族村寨，若遇到火灾、盗窃抢劫、械斗等紧急突发情况时，敲击铜鼓警示并召集村民，不同的事件，鼓点节奏不同，人们根据鼓点行动。在勐海傣族地区工作生活过的云南大学民族史学家林超民先生介绍，傣族人家门口若挂有仙人掌，就表明家有传染病人不宜入内；文山州广南县珠琳镇拖思旧寨的壮族家中，如有人得了天花，就将帽子挂在门口，让亲朋及外来人员注意不要入内。很多灾害疾病讯号的特别传递方式，彰显了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的丰富性特点，类似的预警风俗及传统习惯，在很多少数民族中普遍存在。但不同民族面对不同灾害时，采取的预警及讯息传递物件及服饰的样式、色彩等都有差异，很多差异及其深厚的文化内涵，都值得在未来的调查及研究中进一步挖掘、梳理。

在现当代少数民族地区的防灾减灾工作中，应最大限度发挥传统灾害文化的能动性，“在灾害监测、预报、评估、防灾、抗灾、救灾等工作中注重农户的参与”⁽¹⁾。其中，将现当代灾害文化的内涵及路径，与传统灾害文化融合起来，发挥好民族地区灾害讯息的预警、传递工作是一项重要内容，“完善乡镇一村一农户的灾情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将乡镇以下的灾害信息发布系统深入到每家每户”⁽²⁾。

二是灾害救助物资按人口户数均分共享的传统。西南少数民族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居住状态，平时来往不多，但不影响在灾害及危机中彼此的互帮互助行为，典型表现是各民族对救灾物资的共享传统。在灾后救灾物资的分配方面，少数民族很少发生隐匿窝藏或贪污救灾物资等腐败现象，这与民族文化中面对灾难时物资共享传统的约束作用有关，也与少数民族家庭财产一般呈透明公开状态的习惯有关，不会也没有必要藏私，其贪污的物资也无处藏匿，更与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中很少有偷盗的

意识及行为有关。

三是面对不同类型灾害的自我救助传统。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空间比较封闭狭小，很多灾害是小范围的，灾害后果及损失不大，尤其是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水旱冰雹霜冻等气象灾害等，一般只是几户、几寨或一乡一县受灾，除互助救灾外，更多的是受灾村寨及家户的自我救助。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是民间、私人性质的灾害救助传统，稍大的灾害一般由村老寨长或是半官方的基层统治者、管理者统一协调指挥。

四是灾害发生时不同的逃生技能及传统。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灾害类型不同，其逃生技能也有不同，如地震时跑到屋外空地上，洪水来临时爬上山顶房顶、抱住大树大石，泥石流发生时往侧上方山坡逃跑等，一些技能与当代防灾减灾宣传中普及提倡的措施一致。但随着现当代灾害类型增多、危险性增强，很多民族传统的防灾减灾避灾技能，已不能适应实际需求，传统防灾减灾技能的更新及提升，成为少数民族灾害文化建设中的当务之急。

五是灾后重建时村寨民众具有的联合共建、互助同进的传统，凸显了村寨灾害韧性及自我修复力度。如在灾后农耕中籽种与劳动力畜力等方面的均享互换（工），房屋与公共设施建筑修复时的共建互助，以及对病亡羸弱家庭的抚恤安葬等方面的共助传统。这类由少数民族上层或有威望的村寨长老协调主导，有计划进行的灾后恢复共建，有集体或半官方的性质，使少数民族的灾害文化在实践及传承中，充满了人性及温情的色彩，也是少数民族相互依赖、相互帮助美德形成的基础之一，更是民族村寨灾害韧性修复及持续发展的基础，使村寨能够化解和抵御灾害的冲击，保持其主要特征和功能不受明显的影响和破坏。换言之，灾后重建的互助共建传统，极大地增强了村寨的灾害防御韧性，使村寨能够承受不同类型灾害的冲击并快速恢复生活秩序，保持民族村寨功能的正常运行，并更好地应对未来不同类型的灾害风险。

六是近代防灾备灾的新传统，即少数民族村寨的仓储建设。西南大部分少数民族在早期历史发展中没有仓储的概念，因为各地生态环境良好，人口少，生存空间大，可食用的生物资源数量丰富、种类繁多，除大范围的洪旱地震灾害外，很少有导致饥荒的灾害。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前，绝大部分少数民族村寨几乎没有建立过仓储，也没有仓储的理念及措施，仅在离汉族聚居区或行政中心近的部分村寨间或建有少量仓储。

西南少数民族都有个较为普遍的观念，即万事万物都是“天生天养”的，对人类而言，自然界有丰富的食物资源，随用随取，但不能奢靡浪费，只要用度适量，自然界提供的资源足够人类享用，无须仓储积贮，仓库里的东西不仅不新鲜还会腐烂败坏。这种对生存资源用取有度的思想及理念，形成少数民族利用自然资源的良好习惯，既避免了饥荒的出现，达到了防灾减灾的效果，也防止了浪费及对生存资源物种的过度摄取。这种利用生存资源的传统文化行为，成为西南地区迄今为止依然是中国物种基因库的主要原因之一。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尤其是七八十年代后，传统思想文化的变化，以及日益迅速的国际化使各民族的资源使用理念受到冲击。随着外来移民的进入、人口增加、生态环境的破坏及资源的耗竭，食物资源开始短缺。受汉文化积储备荒的理念及措施，以及民族州县乡基层政权贯彻国家备战备荒等战略部署的影响，民族地区开始设置仓储，百人以上的民族村寨才建粮仓，少则一个，多则三四个，或位于寨子中央，或位于村寨边缘。如云南布朗族为了预防火灾，一般把仓储建在村寨周边，但实际上，在布朗族的资源利用模式面前，仓储的实用性不大，有的根本没有发挥过作用。

（二）西南少数民族防灾减灾文化的传承路径及当代转型

任何民族的灾害文化，都是通过特别的路径及方式，进行文化内涵及訊息的传递、传承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灾害文化的传承方式及传承路径，粗略而言，主要可以分为四类：

一是亲缘性传承的方式，如家庭、亲族、宗族或近邻亲属间常用的防灾减灾避灾技巧，一般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

用这类方式防范、躲避的灾害，大多是范围小、程度轻、影响小的灾害，如旱灾中的取水储水、水灾中的缘木而居、疫灾中的卫生及服药防治、躲避与防范动物灾害等。当然，一些常见的大型灾害防护的文化传统及方法技能，如地震及泥石流灾害的躲避及逃跑方式等，也是此类防灾减灾避灾文化传承的主要内容。

二是地缘性（地域性）的防灾减灾避灾技能及知识体系的传承，如村寨、不同空间中同一个民族间或小地域内不同民族间的本土防灾减灾避灾的知识、技能等。这个类型的防灾减灾文化针对的多是村寨选址、水源地选择、田地选择及耕作防护机制等，以及区域性影响范围较大的水旱灾害、地质灾害的防范方法及具体措施等的交流及传递。

三是族际间防灾减灾文化的交融及传承，其交流及传承的文化传统，一般是针对大型的、后果严重的、民族记忆深刻的灾害，即跨区域、连续性灾害的防范及躲避、逃生路径及知识系统，如大型水旱灾、泥石流、地震灾害、瘟疫的防范、躲避和救助等。这是少数民族传统灾害文化传承中，公共讯息及知识体系、技能、经验的主要交流及传承路径，在现当代少数民族地区的防灾减灾工作中也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四是跨国界（国际性）灾害的防治救助等灾害认知、记忆、思想、理念等文化的交流及传承，兼具族缘、血缘、地缘的综合特点。西南少数民族多跨境而居，但灾害不会区分民族及国界，很多跨界聚居的民族，因地质结构及气候背景、生态环境及生活习惯的相似，常常遭遇同一次地质、气象、疾病等灾害的袭击，其防灾减灾的措施、文化习俗及技能，一般也是共同分享及传承的。这种分享及传承最初是民间进行的，20 世纪后逐渐实现了从民间到官方的转变，官方、民间的传承路径在同一个时空中共存，官方的资金、人员、政策等都得到少数民族的接受及认可。如在中缅、中老、中越等边境跨境而居的泰傣民族的防灾减灾经验及文化传统，就是因为族际、国际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而实现了交融、共享，这是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具有国际性特点的表现之一。

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的传承路径及特点，不仅凸显了少数民族灾害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特点，也对当代中国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建设、对“一带一路”及其国际防灾减灾体系的构建发挥了积极的资鉴作用。目前，国际社会面对频发的跨国巨型灾害，亟须共同建立协调、联动、高效的国际减灾合作模式与机制，从不同渠道、途径开展全方位、多渠道的防灾减灾国际合作，以提升各国的防灾减灾能力，促进区域间的可持续发展，并在其中有针对性地提高跨境灾害的综合防治能力及水平，制定国际化的、科学且系统的防灾减灾机制。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而言，构筑起面对中国—南亚东南亚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综合性防灾减灾体系，也是亟须进行的工作，这也是西南少数民族防灾减灾文化面临的当代转型。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国际疟疾基金项目的支持及研究下，中国云南的疟疾防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备受称道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中国疾控中心在输入性病例数量长期居高不下的情况下，采取国际、跨国联合防控的措施，越过国境线防疫并取得了极好的效果。如德宏盈江县的疟疾防治，从中缅边境的防治往缅甸国境内推进了 50 公里，在中缅间人员交往流动极为密集频繁的情况下实现了疟疾的可防可控，境内疟疾患者人数直线下降，防治效果显著。这是官方大力主导推行疾病防控、当地少数民族积极支持配合取得的防病治病的成绩，是少数民族地区在现当代防灾减灾行动中，官方、个人及家庭努力协调配合，使国际性的跨国防疫取得成功的典型案例。

因此，应充分利用中国传统灾害文化的优势，发掘并利用好西南少数民族在自然灾害防控和防灾减灾领域的经验技能，利用现当代的防灾减灾理论和技术优势，建构起现当代少数民族新型灾害文化体系，“强化对地观测、高分辨率遥感、导航定位、通信技术、地理信息在防灾减灾领域的应用，加快防灾减灾产业链发展，促进防灾减灾技术‘走出去’，快速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防灾减灾基础与能力，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①。

当然，国际合作及跨境民族间的传统文化交流机制，应该在其中发挥必不可少的作用，在此过程中提升、构建新型的、面向国际的民族灾害文化体系，“鼓励、支持在‘一带一路’重点国家设立防灾减灾海外研究中心或网络；联合沿线国家防灾减灾科研机构与组织组建‘一带一路’防灾减灾科学联盟；推动研建‘一带一路’重大自然灾害仿真模拟系统，提升风险防控能

力；构建“一带一路”防灾减灾救灾科技合作框架与体系”^②。毫无疑问，这是西南少数民族传统灾害文化的重生及持续发展焕发的生机，只有这样，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才能真正成为“推动跨国跨区域综合性防灾减灾合作和践行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行动”^③。

三、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的特点及弊端

中国少数民族大多位于边疆，灾害时空分布的畸零特性明显。部分地震带、气候带或地质结构带波动区的灾害，影响畸轻畸重、分布不均衡的特性尤为突出，这与边疆民族地区多位于自然地理及生态疆界线^④上，气候带及干湿带分界明显，地质结构特殊，自然灾害类型独特有关。各民族灾害文化的积累、传承不绝如缕，虽然很多内容较少进入正史，却在民间以不同形式流传。在“华夏失礼，求诸野”的传统文化变迁趋势下，很多中原地区散佚的灾害文化，在民族融合、交流中以不同的内容及表现形式，流传、保存在民族地区，逐步形成了具有区域及民族特色的防灾减灾避灾的文化体系。

（一）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的特点

灾害文化是文化的一种特殊类型，具有文化的共性及独特性。西南少数民族的灾害文化，既具有普通灾害文化的内容及特点，也具有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从独特性的角度看，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主要具有以下三大特点：

第一，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具有历时性、包容性、适用性并存的特点。与其他地区灾害产生、变迁规律一致的是，西南民族地区的灾害也具有频次、类型增多的趋势，呈现出很强的历时性特点，故很多区域尤其是民族聚居区的防灾减灾文化，也随着灾害类型的变化而适时调整。在近现代全球气候多变及山区开发背景下，山区常住人口不断增加，山地原始植被被大面积破坏，山区半山区土地被垦殖，水土涵养能力大大降低，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暴雨洪涝灾害增多，流域性洪旱灾害频次增多，受灾面积、人口及灾害损失呈正增长趋势。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自然环境复杂多变，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自然灾害千变万化，灾害文化也随之不断丰富及完善。很多民族在防灾减灾过程中相互帮助、文化不断交融互鉴，形成了灾害文化的包容性特点。在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是可以不跟其他民族交流而独立生存发展的，各民族为了生存及发展的需要，既要传承自己民族的文化，也需要吸纳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尽管江河峡谷层层阻隔，但不同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从未停止，不绝如缕。即便在交通不便山川阻隔的怒江、德宏、红河等地区，少数民族也通过溜索、马帮等特别的交通方式，互通有无。西南少数民族由此形成了对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学习及借鉴、尊重及包容的习惯及特点。因此，各民族的灾害文化，在传承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兼容并蓄了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内涵。

近 50 年来，在某些强降雨集中、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及水旱、低温冷冻、冰雹等气象灾害的频次出现爆发式、单点式增多的现象。各民族的防灾减灾文化也随之发生变化，逐渐从宗教、信仰、禁忌习俗等消极的避灾，发展到积极救灾，提前防灾、减灾等主动防灾的层面；在与周边民族交流的过程中呈现开放、融合的发展趋势，民族间的分界及隔阂被打破，从个体、家庭、族群、村寨的小集体、民间的防灾减灾行为，发展到多个村寨联防联控的阶段，更重要的是开始推进到与官方配合、接受官方统筹调剂、分层领导的层面。

如很多经常受到泥石流、滑坡等灾害侵袭的少数民族村寨，开始积极配合官方的搬迁、扶贫政策，调整防灾减灾传统，一定程度上摒弃了旧的、适用性不强、效果不明显的防灾减灾措施，吸收近现代防灾减灾先进经验及技术，使少数民族灾害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大，包容性日益凸显。最典型的是云南怒江的独龙、怒、傈僳、普米等民族，接受现代化的建筑选址及建筑材料、建筑样式，从生存条件恶劣、交通不便、气候及地质条件恶劣的深山区，从悬崖峭壁的村寨里，逐步搬迁到了平坦、安全的坝区及山脚。其建筑及家具布局沿袭了本民族传统样式，并与现代防灾减灾文化相结合，在建筑格局、房屋朝向、窗户大小、房梁位置等方面，甚至吸取了其他民族有效的防灾减灾传统要素。这就使搬迁民族因出行及生产发生的交通意外及罹患气候病、地区病的风险大大降低，遭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达到了防灾减灾的良好效果。

第二，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具有传承性、累积性、固守性的特点。作为民族文化中最具有实用价值的内容，不同阶段积累下来的灾害文化，都有其存在、传承的价值及实用的意义，其中防灾减灾文化必然是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其传承路径及方式，既有普通灾害文化传承的特点，也具有民族区域文化传承路径及方式的特点。西南少数民族在不同时期积累、传承下来的灾害文化，尤其是灾害文化的经验和教训，对各民族有效防灾避灾减灾、保持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少数民族灾害文化的固守性特点，主要是指对自己民族及村寨已经形成的、熟悉的灾害文化理念及认知、习惯保持着坚持、坚守的传统，在老一代人身上，其思想观念及行为习惯甚至到了固执的地步。如很多在山区居住的少数民族老人，在可以用电或太阳能的情况下，依然长期坚持用木柴、火塘烤火做饭烧水。由于少数民族的房屋建筑多采用木质材料，用火塘烤火做饭往往导致火灾或一氧化碳中毒。尽管教训深刻，政府多次宣传教育，但很多老人依然固执己见。这不仅对森林生态环境保护不利，也使防灾减灾工作的推进困难重重。固守传统文化的民族特性，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有极大的优势，但对某些习惯及传统的过分固执和坚持，也会带来交流及借鉴的障碍，使很多实用、有效的灾害防御措施不能被吸收，给防灾减灾工作及其实际功效带来消极的影响。

第三，少数民族灾害文化还具有地域性、丰富性、变通性的特点。不同地域的灾害类型受到地貌、地质结构、气候及自然生态基础等因素的影响而各具特点，具有强烈的地域性色彩。如地质结构脆弱的区域常常发生地质灾害，季风气候变化突出的地域常常发生气象灾害，如果二者兼具的地区，则常常因为气象灾害引发地质灾害。

不少民族受地域及相关因素的影响，具有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及习惯，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地质结构等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破坏及影响。在不同地域形成的民族文化，也具有各自特殊的内涵，即灾害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特殊内容，其地域性特点是显而易见的。如滇黔桂的少数民族如苗、瑶、壮、彝、布依、水、侗等聚居的喀斯特区域就是如此，山地面积广、坡度大，表土层较薄，成土时间长，地质多为砂砾岩结构，山区开发后森林急剧减少，原始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山地水土流失极为严重，水土涵养能力下降，很多地区从潜在石漠化区域变为石漠化区域，石漠化区域呈扩大趋势，19 世纪后的史籍所见的水旱灾害频次开始增加。

20 世纪以来，西南喀斯特地区的灾害频次呈加速度式发展，水旱、滑坡、塌方、泥石流、霜冻等成为这些地区最频繁发生的灾害类型，不同民族地区应对灾害的方式也千差万别，灾害文化的地域性特点极为突出，如云南西畴等地区，为了改造及治理石漠化，各村寨民众书写了一个个当代愚公移山的新故事，采用了挖石开路、搬土造田等方式改造石漠化景观，发展农业及经济林生产，形成了当代独特的“搬家不如搬石头，苦熬不如苦干，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为内核的“西畴精神”，也形成了“不等不靠不懈怠，苦干实干加油干”等地质灾害防御的新文化内涵。西南其他民族聚居区也因气候、地质、生态环境等自然条件的相近或差异，灾害类型及环境影响强度出现了相似或差异的情况，相应的文化内容也随之进行了变通和调整。

（二）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的弊端及其克服路径

每一种文化，都难免存在弊端和缺陷。西南少数民族传统灾害文化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如由于对家及房屋、村寨的感情，对神灵庇佑村寨的认知理念发生偏差，尤其对祖先超能力认知观念及遗物怀有感情的老人显得格外固执，灾害的打击及损失就更大。在面临新旧理念冲突，与官方管理政策及措施不一致时，其弊端更凸显。概言之，西南少数民族传统灾害文化存在两个层面的弊端：

一是个体（家庭）层面存在的弊端。少数民族防灾减灾文化中，年龄与防灾减灾理念、认知与实际行动存在反向递增的情况，即年龄越大，防灾减灾理念与行动力吻合度越低。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对祖先神灵的灾害护佑能力存有执念，不愿意轻易离家，即便灾害来临也决不听劝诫，非要坚守祖屋，最终遇难。

如云南佤、彝、景颇、傈僳等一些山居民族的老人，在发生地震、泥石流等灾害时，认为家里住着的祖先会护佑房子，坚决不离家，很多人因此丧生。如一些灾害隐患区的老人即便被政府工作人员强行带离逃出，但工作人员离开须臾，就又自己偷跑回家。灾害轰然而至时，他们就成为最先罹难的人群。这在西南少数民族中较为常见，尤其是一些德高望重、具有极大影响力的老人的固执言行，使少数民族灾害文化面临着新的传承危机。

二是群体层面存在的弊端。村寨族人对自己周边生存环境的变化及灾害潜在危机认知不够，不愿搬离已经出现灾害风险征兆的村寨。很多少数民族在早期村寨选址时比较慎重，对水源地、田地与聚居地等因素的考量、选择比较合理。村寨初建时，生态环境极好，人口密度不大，生存资源丰富，环境承载力及自我修复力都很强，很少有灾害风险。祖祖辈辈繁衍生息于斯，早就习惯了原生地的环境，往往忽视了其村寨及周边的山地因多年的开发垦殖，已出现了生态恶化、水源枯竭、水土流失严重的情况，山坡地的自然水土涵养能力被破坏，灾害风险增强，气象灾害及地质灾害隐患增加，交通、通讯不便，急需搬迁。

但很多村民对此认识不到位，认为搬迁后远离祖宅和祖先，也远离了水源和田地林地，不仅耕作等农业生产不便，村寨的竜林、竜山和神树神泉等都要重新选址，现当代开发及生产生活空间扩大，已经没有合适的山林空间可供选择，即便有，限制因素也较多。且很多搬迁的村寨都要与其他寨子合并居住，对具有不同民族习惯及风俗信仰的人群而言，生产生活都极其不便，因此老人几乎都坚持住在老寨不愿搬迁，年轻人考虑到交通、求学、就业等因素，积极配合政府搬迁。老寨在年轻人搬走后，老龄化严重，基本生活设施得不到维护，面临着新的、更大的灾害风险。每当山洪泥石流爆发，村寨老人几乎都来不及逃生，救援人员也因交通阻隔很难及时赶到，绝大部分老寨往往因此覆亡。

因此，少数民族对灾害环境变迁及其严重后果的认知差异，不一定符合人们对少数民族防灾减灾文化美好的预想和判断。其防灾减灾思想及行动出现误区，效果就出现偏差。而现当代少数民族地区整体的防灾减灾能力，仍然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程度，再加上不同民族地区的常态灾害成因机理存在着较大的复杂性、多变性、不稳定性，很多少数民族传统灾害文化中的经验及技能，不仅远远达不到实际防灾减灾工作的需求，离国内及国际标准也有很大距离，使少数民族灾害文化因此面临着挑战及持续发展的危机。如何弘扬优势、克服弊端，找到少数民族传统灾害文化转型的合理路径，避免群体性灾害认知误差导致的灾害群体性损失，是目前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灾害文化的构建及其防灾减灾体系建设中不可忽视的主要因素。

为了避免传统灾害文化的弊端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在现当代少数民族灾害文化的转型提升中，不仅要发扬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还要提升少数民族灾害文化的现代性内涵，主要有三条路径：

一是防灾减灾知识及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普及、现当代防灾减灾技能的教育培训。在民族地区进行常规化的、少数民族能接受的多形式、多语种的现代防灾减灾知识及技能的宣传普及和培训，如设置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栏，利用广播电台、电视机、手机微信等平台及现当代媒体网络的宣传动员力量，开设防灾减灾知识宣传的公众普及栏目，用民族语推送防灾减灾的公益广告及知识技能，并在学校、单位及村寨组织多种形式的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及演练活动。当然，各省州县乡民族村寨都可以编制不同层次及内容的、适合本地民族防灾减灾的科普读物、挂图或相关的音像制品，或诸如抖音等便于在手机上观看的视频、音频、文案广告等，推广国际国内先进的防灾减灾经验，尤其是成功的案例和知识、理念，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及能力，在现当代防灾减灾体系建设中，促使少数民族灾害文化的提升及转型。

目前，提升少数民族防灾减灾技能的宣传，正在成为少数民族灾害文化转型中的新形式、新内涵，如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地震灾害的预防中，一些团队已经开始组织拍摄多民族语言的《地震百科知识大全》，其中含藏语、傣语、傈僳语、拉祜语和景颇语 5 个少数民族语种版本，下发到民族地区、边疆和贫困山区播放；制作了少数民族民歌专辑，完成了“农居抗震·关爱生命”“政策性农房地震保险在云南正式落地”“地震预警·与地震波赛跑”“主动源探测·给地球做 CT”等公益科普视频产品；还制作了《普洱对话——景谷地震》《防震减灾示范教学片》《防震示范演练》《中小学地震安全教材》等。^①从笔者的调查中了解到，山区民族村寨的防灾演练等活动也已经在普遍开展，少数民族群众的参与度及认可度也较高；基层地质灾害隐患检测装置及人员等的设置也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及时性，实现了成功避灾的实效。

二是建立民族地区灾情信息搜集与及时报送机制。借鉴历史上报灾勘灾救灾机制及其良好成效，吸纳不同民族的群众参加，在民族地区建立一套及时、准确、完善的基层灾情信息搜集及报送机制，及时向群众传达灾害讯息，以提高少数民族的灾害预警及危机意识，“完善群测群防制度，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全民防灾减灾意识，充分调动和发挥农户参与农村防灾的积极性加强基本灾害知识普及和防灾意识提升；不同灾害的防灾技术手段，如作物防旱避旱的基本方法、预防地质灾害的建筑物选址和修建等”^{〔2〕}。

少数民族地区还应考虑制定新型民族村寨选址和民居修建的质量标准、区域灾害安全规范标准。在各民族村寨尤其是灾害搬迁村寨，制定村落搬迁的规划标准、房屋建筑的灾害安全测量及防范标准，如村寨所在地的地质条件、住房的抗震性能、村寨道路的通达便捷等，使少数民族灾害文化尽快转型、更能适应当前防灾减灾避灾的实际需求。

三是加强民族地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尤其是防灾减灾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少数民族聚居区交通、通讯、卫生及医疗条件的改善已是当务之急，尤其是交通及通讯条件的改进更是重中之重。为了灾情讯息上报及时及相关信息的流通，提高抢险救灾物资的抵达和受灾人员的转移安置，急需提高灾害易发区和外部联系的交通道路、通讯设施建设，村道、乡道、县道的修筑及维护通讯信号的畅通，应作为生态文明村寨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

鉴于西南少数民族部分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及气候条件，除了将灾害隐患区的少数民族群众搬迁到适宜居住的安全地区、改造村寨的危险建筑、加固危险设施等措施外，还可在灾害频发的少数民族地区着重进行防灾减灾隔离带、避难所、防护墙等灾害防护工程建设，这是少数民族灾害文化系统调整和优化的必经之路。

四、余论

各民族的建筑、饮食、服饰、医药、禁忌习俗、信仰等文化的发生及变化，其原因是多源的。换个角度看文化，就会发现文化的另一重内涵，故其多源及多面向特点，应成为文化源流研究中的共识。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化，在起源及传承上就具有浓郁的防灾减灾避灾内涵及特性，这些文化能够传承、发展，也与其能够发挥防灾减灾避灾的实际功能有密切关系，此即灾害文化功能的辐射性禀赋。西南少数民族的灾害文化，是中国灾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南各民族的防灾减灾避灾实践中，在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西南少数民族众多，文化类型多样，其防灾减灾文化保存了大部分少数民族在具体防灾减灾避灾中的经验及教训，具有极大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但并不能说明西南少数民族防灾减灾文化仅此而已，其他内容还需要灾害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不断的努力及探索。其中很多防灾减灾的文化传统不仅属于西南少数民族，很多地理地貌及生态环境相似的南方甚至是北方少数民族，也有类似的灾害文化内涵及传统，即在同一个区域生存的不同族系的民族，其灾害文化也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这就是少数民族灾害文化存在的共性；不同民族的防灾减灾文化，也存在极大的差异性，甚至同一个民族、支系因聚居范围比较宽泛，或不同支系跨越不同的气候带或地理空间，其防灾减灾文化也就存在着明显的地域性差异。

“路径依赖”惯性是学术思考潜意识的行为，并在很多问题的思考上形成自我强化的效应，其弊端限制了学术界域的打破及不同层域间的融通。就像本文涉及的民族灾害文化，初看起来都似曾相识或很熟悉，以往多从民族专业文化或单一文化的视角来看待这些源于少数民族的传统智慧，很少从多维的角度尤其防灾减灾避灾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文化的原动力及深层内涵。这种单一的观察视角或史料解读的“路径依赖”，让人们忽视了史料里原本含有的其他内涵，也就忽视了民族文化中固有的多重内涵。一旦变换观察及论述的视角，大胆脱离惯性的“路径依赖”，就能发现以前人们熟悉的知识谱系中未曾被发现的重要内容及史实，甚至能发现隐藏在史料背后的真正贴近历史真实的内容。因此，不仅学科视角、研究方法需要多元化，对史料解读、分析的角度也应提倡多元甚至反向的路径，从传统史料中发掘出历史及文化原本所具有的丰富内涵。西南少数民族防灾减灾文化的研究及思考，无疑也适用于这一原则，它对民族文化的再审视、再解读，往往能带来新发现、启动新思考，更清晰地触及历史及文化本真的面向。

值得强调的是，西南少数民族的灾害文化，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各民族的灾害文化，不仅与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思想乃至艺术、军事等密切联系在一起，也与其他文化现象密不可分。一个民族的文化现象，有可能同时具有几个甚至是若干个文化要素、文化维度及面向，也有可能只是专指的、特别的或唯一的文化要素。西南少数民族的灾害文化，与其他文化及组成要素融合、联系起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存在及传承模式。在现当代防灾减灾体系构建中，提升、增强灾害防御能力建设，凸显其韧性、适度性及国际性原则，成为西南乃至中国少数民族灾害文化现代化转型的适应性目标。

注释：

1 李永祥：《傣族社区和文化对泥石流灾害的回应——云南新平曼糯村的研究案例》，《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李永祥：《灾害场景的解释逻辑、神话与文化记忆》，《青海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叶宏：《地方性知识与民族地区的防灾减灾——人类学语境中的凉山彝族灾害文化和当代实践》，博士学位论文，西南民族大学，2012年；叶宏、王俊：《减防灾视野中的彝族谚语》，《毕节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王健、叶宏：《文化与生境：贵州达地水族乡对旱灾的调适知识》，《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罗丹、马翀炜：《哈尼族迁徙史的灾害叙事研究》，《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8年第2辑；孙磊：《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区域和文化差异——以2010玉树地震青海灾区和2008汶川地震陕西灾区为例》，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2018年；马军：《瑶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知识与减灾》，《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张曦：《地震灾害与文化生成——灾害人类学视角下的羌族民间故事文本解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能继峰：《藏族有关地震灾害的地方性知识研究——以玉树“4.14”地震为例》，硕士学位论文，西北民族大学，2016年；梁轲：《云南贡山县独龙族传统文化与防灾减灾研究》，《保山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杜香玉：《佤族灾害认知及地方性防灾减灾知识研究》，《民族论坛》2020年第2期；何云江：《佤族聚居区的灾害记忆》，《保山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谢仁典：《云南佤族村落火灾频发原因及应对方式探析（1959-1986）》，《保山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谢仁典：《云南佤族雷击灾害祭祀浅析——以西盟佤族自治县翁嘎科镇龙坎村为例》，《保山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2 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周琼：《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环境变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杨伟兵：《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1659~191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3 《秀山封山护林碑》，黄珏主编：《云南乡规民约大观》（上），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103页。

4 《镇沅直隶州永垂不朽碑》，曹善寿主编，李荣高编著：《云南林业文化碑刻》，芒市：云南德宏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307页。

5 《弥祉八士村告示碑》，曹善寿主编，李荣高编著：《云南林业文化碑刻》，第515-517页。

6 庄天慧等：《西南民族贫困地区农户灾前防灾决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软科学》2013年第2期。

7 庄天慧等：《西南民族贫困地区农户灾前防灾决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8 葛永刚等：《“一带一路”防灾减灾国际合作战略思考》，《科技导报》2020年第16期。

9 葛永刚等：《“一带一路”防灾减灾国际合作战略思考》。

10 聂选华：《构建中国-南亚东南亚防灾减灾体系》，《社会主义论坛》2020年第6期。

11 周琼：《环境史视域中的生态边疆研究》，《思想战线》2015 年第 2 期。

12 李道贵等：《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探索》，《城市与减灾》2020 年第 4 期。

13 庄天慧等：《西南民族贫困地区农户灾前防灾决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